



## 第一篇

# 王智章訪談錄

1986年12月13日，王智章在總統府前拍攝鹿港反杜邦。  
(蔡明德／攝影)



# 1 叛逆的青春

## 1-1 糖廠國小

我在花蓮縣光復鄉出生長大，讀的是糖廠小學。就光復這個鄉下而言，糖廠小學就像個私立小學，是專門為糖廠員工而設的，升學率特別好。我父親是地政人員，雖然不是糖廠員工，我們家也不住在廠區，但父母注重我的教育，加上我外公在糖廠工作的關係，就想辦法弄我進去讀糖廠國小。

從廠區宿舍的配置看得出來，糖廠其實是一個階級分明的小社會，日據時代就留下來的獨棟木造宿舍，有前後院的，現在已經整修為民宿經營，當年都是白領階級住的；而在廠區東邊俗稱「東宿舍」的台灣宿舍，則是工人階級住的，同樣是木造房，卻是板壁隔間一間接著一間，凸顯出階級差異。另外，我們每個年級有兩個班，甲班學生大部分是白領階級的子弟，乙班則大都是工人的子弟，還有一些原住民同學。我讀乙班，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，早已經感受到階級的不同，尤其甲班還有一位是廠長的女兒，師長對她客客氣氣的，她家裡若有什麼事，就有工友來接她回去，吃飯的便當也不一樣，感覺她受到特殊待遇。

1960年代，糖廠管理階層大多是外省人，本省人升不上主管階層，頂多當個領班之類的，而傳達室工友、園丁雜役則是退役老兵轉任，其中也有同學的父親，同樣是外省籍但他們的處境待遇很不同。我小時的玩伴都是工人、工友的孩子，有外省籍也有原住民，在一起玩得很好。現在回想，這段成長經驗很早就影響我「關注」階級認同，不是省籍，而是階級。還有，我爸爸工作的地政事務所位在鳳林鎮，有許多住在光復的原住民，因為事務所太遠而且語言無法溝通，他們不懂國語，而我父親懂一點日語，他們寧願晚上來我家找我父親用日語談事情，等於我父親晚上還在上班。因此，從小我就接觸很多原住民，看父親如何與原住民相處和處理事情，感覺「人應該是怎麼樣子」，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已根深柢固。

我父母非常重視我的教育，偏偏我從國中就不學好——也不能說不學好，一群鄉下野孩子，有人帶香煙或檳榔到學校，我們就會跟著偷偷吃，這根本沒什麼，

大人們也都知道啊。但我母親擔心，不希望我待在那種環境，在我升國二時把我轉學到花蓮市的花崗國中。其實那麼小就離開家裡並不見得好，反正我還是不太愛唸書，一直到僥倖考上高中都是這樣，甚至註冊後沒有去教務處領書，根本是在混日子。

就是這樣認識了黃崇憲，然後「老孟」孟東籬<sup>01</sup>。

## 1-2 撿到黃崇憲

我讀的花蓮高中在海邊，從教室就可看到海浪，我幾乎每天都去游泳，書包裡沒有課本，都是小說或者雜書，有時上學拿一把吉他，根本就直接到海邊晃，沒有進校門。有一天我蹺課在海邊游泳，看書，休學的黃崇憲漫遊去海邊，看到我在看書：「你在看什麼書？」

《野鴿子的黃昏》，王尚義寫的，水牛文庫出版。

黃崇憲是台南新營人，在台北建中念書，高三下快聯考了突然休學晃到花蓮來，而我多念了一年，還是高二學生。當時我們在校園都有走投無路的感覺，他也看這些書嘛，就跟我借一支菸，開始聊起來，聊開了以後，崇憲就住到我花蓮的宿舍。因為我們都讀過老孟的書，包括他翻譯的《地下室手記》等等，我們也聊到齊克果、卡繆等存在主義的作家，自然就會聊到老孟，但起初我們不知道老孟住在花蓮，是後來跟一位大幾屆的朋友閒聊，他說老孟住在花蓮啊！我們都很驚訝，他還給我們地址，我們兩個就直接衝去找老孟了。

老孟當時住在博愛街一間日本宿舍，有一個小小的院子，小小的木門。我們過去敲門，出來應門的是一個男子，喔！這麼高，帥氣，很瘦。我們先自我介紹，他也不客套，就帶我們進去，說：「坐！我這裡剛好有一點梅子酒，朋友給的，要不要喝一點？」然後，他好像抽起菸來，感覺沒有任何架子。我們當然有很多好奇，就閒聊發問「你翻譯這些書是幹什麼」等等問題，崇憲比較會發問，我笨笨的，多少聽一點。

崇憲休學因為是自己辦的，家裡都不知道，其實也算是逃學。而我，反正不

01 孟東籬（1937-2009），本名孟祥森，1948年隨親移居台灣，台大哲學系、輔大哲研所畢業，以生態、哲學為主題創作，並大量翻譯外文書籍。曾任教於台灣大學、世新大學、花蓮師專、東海大學，1984年移居花蓮鹽寮，1997年定居陽明山至過世為止。

愛上學沒地方去，很自然就會去找老孟。在他家很自在，他不管我們，趴在榻榻米上專心翻譯，旁邊點一柱香。我們在旁邊玩，翻他的書來看，有時候就出去走一走；反正我們玩我們自己的，他做他的功課，他休息時我們就聊聊天，有錢就吃好一点，沒錢就吃饅頭。

### 1-3 老孟的身教

老孟和我們的相處，不太跟我們講道理的，是跟我們混。他是真的跟我們一起混！崇憲鬼靈精一個，調皮搞蛋，問題又特別多，老是跟老孟抬槓，老孟說他像當時國語日報漫畫人物「淘氣的阿丹」，就幫他取個外號「阿丹」。我懵懵懂懂的，雖然那個年紀已經看了一些存在主義的書，但看了也像沒看，有懂又像沒懂，但多多少少受到影響，潛移默化，只是我們並不見得知道。老孟從來不會說「今天我們來談什麼」，沒這回事。每次我們去他家，他總是趴在一邊做翻譯，我跟崇憲在另一邊胡鬧瞎搞，等老孟閒下來，我們就聊聊天或陪他一起出去散散步；不然，就拐他去喝酒，尤其是他的稿費來時。當年給稿費不是轉帳到帳戶，大都是買郵局匯票，由郵差送到撰稿者家中，再拿匯票到郵局兌換現金出來，所以如果有郵差來老孟家，我和崇憲心裡頭就暗爽，勸老孟說：「走吧！今天不要翻了，先去領出來吧！」半推半拉，把他哄出去。

不管怎麼樣，老孟對我們的影響其實是一種「身教」，我常說「我跟崇憲是老孟帶大的」就是這個意思。他不是課上教我們什麼，而是跟我們一起混，走在街上看到一些細微的事情，不需要藉什麼大題目，就能引發談論。他不威權，有一個開放的心靈，我們常和他抬槓、挑戰他，有時被我們氣得全身顫抖，我現在回想，有些地方我們也沒有什麼錯啊，只是當時我們還太年輕，許多事情似懂非懂，蠻有趣的。

我們的相處之間，崇憲偏重人文、哲學方面的討論，我雖然參與了一些，但我常跟老孟談的是生態、環保方面的議題，而老孟也關心，就像他的《愛生哲學》（1985，爾雅出版），他對動物保育有一套理論，所以我們之間有很多討論。如果我後來順利升大學，很可能是去讀畜牧，因為我對這方面有興趣，常常跟老孟討論得很熱烈，也有共同的夢想，想要找一塊地，在那裡種些什麼，在這裡蓋個什麼。老孟當時才 35-36 歲而已，一樣還有夢想。

跟老孟的互動，一方面是他有自由的心靈，一方面是我討厭體制。我很早就認為學校教不動我，而老孟是亦師亦友，他可能也覺得我跟崇憲這兩個小子本質還不錯，像人家說的「孺子可教也」，可教可牽；否則即使他心靈開放，也不見得跟所有人好相處，容忍所有年輕人到家裡撒野。而且也不是年輕人都喜歡他，他有很多舉止是離經叛道的。

### 1-4 銀馬車流浪記

能在十七、八歲時認識老孟，我覺得很幸運，那個年代有許多年輕人也在尋找這樣的心靈寄託，一個引導的人，但是沒有像我和崇憲這樣幸運。我以前文章也有寫過<sup>02</sup>，像我這樣完全不可能在體制下活過來的人，如果沒有碰到老孟以及更之前認識崇憲的話，不知道會變成怎樣。這當然也不用事後假設，只是自己難免會去想，走過的年少青春，我自己覺得很幸運、很精采。

我記得有一天，崇憲突然說：「我要離開花蓮了。」那也不是為了什麼，他覺得留在花蓮時間夠了，還要去流浪，生命不能停留，還要去「歷練」，就只是這樣嘛。但歷練什麼狗屁？我們也不曉得。我就說：「好啊！崇憲，就這樣吧！那去跟老孟辭別吧！」我們就去找老孟。老孟說：「好啊！」就從他有限的現金裡面掏出一些錢，多少錢我忘記了，要給崇憲當盤纏，還有一點點感傷，「好吧！就這樣。」

那種感傷喔……狗屁啦！一走出去老孟家，看到路邊一家小麵攤，想說總要喝一杯再離開吧？喝了幾杯，口袋撈一撈，老孟還有給一點錢嘛，幹！想到花蓮火車站旁有一家地下室的西餐廳，叫「銀馬車」，聽說還有 piano 現場表演，以前常經過，都不敢進去，頂多在店門口探一下，我們想說都不曾去踩踏過，「走！」這次我們兩個就進去了，坐下來，啤酒就叫一手來。

酒拿來後，兩個也不知道要幹嘛，就默默地喝。傍晚時，一個有點喝茫的中年人，看我們兩個少年仔坐在這兒，走過來說：「你們穿牛仔褲，介拗！我也有牛仔褲啊！」當時穿牛仔褲是很時髦的。但他已經有點醉，說不上幾句話他老婆就把他抓回去了。老孟給我們的錢當晚就花掉了，也都喝茫了，旁邊就是火車站，

02 王智章，〈綠色小組的社會實踐：為懷念吳耀忠而作〉，《走過八〇年代》思想第 22 期（台北：聯經，2012/11 初版），頁 251。

但是我們還沒走到，再差不多 20 公尺就可以到了，那晚我們還是回去老孟那裏，可能也很晚了，我們不好意思進去，就坐在門前累得睡著了。

老孟有早起的習慣，早上要出門散步，門一打開：「兩個小鬼，睡得像兩條狗！」我們那時候實在太匪類，其實他都知道我們在搞什麼鬼，但沒有說破，他不會問「你們是去哪裡喝成這樣？」他是這樣在教我們。

崇憲後來回去念書，台大畢業後曾短暫在中部教書，綠色小組剛成立不久，他偕同妻子赴美留學，待他學成歸國到東海大學教書，我已回到東海岸定居。我們一起走過慘澹的青春年少到現在，四十幾年來因工作的關係時而疏離時而混在一起，我們一直持續著年少時的情誼，而崇憲也因此和綠色結下不解之緣，誰也想不到他在德惠街的房子後來竟然成為綠色小組發跡的根據地，為我們的友誼帶來更多溫暖的回憶。



## 2-1 對體制不滿

我是 1956 年出生，高中混了幾年沒考大學，1977 年初去當兵。

1978 年 8 月，我們整個師從馬祖調回台灣，改駐楊梅高山頂，我在師部連當軍械士，當時已經是老兵剩不到半年就要退伍了，連長叫我們這些老兵輪流當伙委負責採買，那是涼缺，每天早上軍車載各單位的伙委去中壢市場買菜，只要點點菜、說好金額，菜販就會把菜扛到車上，我簡單弄一弄就四處去逛，很吃得開，有時候甚至不回營，隔天再直接到中壢市場會合。這因為我是老兵了，而且師部連連長也是個整天喝酒的老芋仔，不太管事。

我記得當時休假就上台北天母找蒼鬱、阿豐他們，有一天我突然聽到收音機說「中美斷交」，覺得事情不太對，應該要立刻回營，好像不能不回去，因此我就趕野雞車回去，在車站的時候也感覺到一種凝重的氣氛。不料回到部隊以後，連長就叫我說：「阿章啊，加菜加菜！」發生這麼大的事情，回來你跟我講第一句話卻是「加菜」，為什麼？連長說：「難得大家都在家啊！」我們師部連是跟師部的軍官同一個伙食團吃飯，軍官從來沒有全員到齊過，隨時都有人在休假，而那次是所有軍官都回來，放假的全部收假回營。但是面對台美斷交這種狀況連長卻只想到加菜，我內心想著這種部隊能打仗嗎？心裡覺得很嘔。當時部隊都有養豬，通常加菜就是殺一條豬，我就故意反問連長可以殺兩條豬嗎？連長說：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殺兩條，難得大家都在家。」加菜時，士兵都喝紅露酒，軍官則喝紹興酒，每桌兩瓶。我還說：「那酒都喝紹興好了，難得大家都在家。」當時我覺得很賭爛，想把部隊菜錢都花掉，我那氣憤的情緒難免就會表現出來，但部隊裡「細胞」太多，上面軍官都會做記號。

不久師長換了，人事也大調動，把師部連連長也換掉了。我們老兵其實乖乖等退伍就好，我也不是不乖，不過就是有一次不假外出或是忘記時間回營，新連長竟然把我簽「禁閉」一個禮拜，也搞不懂簽文竟然還送到師長那裏。新的師長早就知道我的案底，也不知道他有多麼恨我，在他剛佈達師部不久，有一次師部



## 3 雜誌美編

### 3-1 今日電影

退伍後那幾年我在台北晃蕩過日子，沒正式的工作也不想定下來，1982 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，我開始編起雜誌來。那是王墨林在編《今日電影》的時候，透過黃勝豐介紹我去當美編，我不認識王墨林，也不知道什麼是美編，但我還是去了，因為我想到可以免費看試片，很高興就去了。去了，他們就要我在辦公室坐一個位置，但我跟他們說我習慣在家裡做，我要拿回去做，他們也不管，我就拿回去，但心裡開始慌張：「完了！這稿子該怎麼編？」那是還用針筆做美編的年代，我去買了或是跟人家借來兩支針筆，剪剪貼貼土法煉鋼，結果也讓我弄了出來。他們也不管好不好，王墨林也不懂，有出刊就好。

後來，蘇慶黎要編《生活與環境》、《夏潮論壇》<sup>04</sup>，找我跟鍾喬去幫忙。舊的《夏潮》是在 1976 年 2 月創刊的，在台美斷交之後不久，就跟一些黨外雜誌莫名其妙被停掉了；總編輯蘇慶黎在高雄事件後曾被約談，但沒有被關，後來她又陸續辦了這些雜誌，很多文章都先拿去給陳映真過目。有一次我送稿子給陳映真看，遇到「蔡桑」蔡明德，那時《人間》雜誌尚未創刊，蔡桑是在幫立達藥廠編雜誌，他看到我一直問：「你係也來？」我反問：「你係佇這？」蔡桑跟我是花中同一屆，但他讀好班，又不喝酒，本來不相往來，後來我轉學玉里高中就沒見過面，想不到多年後竟在台北相遇。

### 3-2 蘇慶黎和夏潮論壇

我在夏潮論壇工作時，跟蘇慶黎都住在雜誌社裡，位於新店大豐路的巷子。鍾喬已經結婚了，沒住那裡，但還有一個房間是給「老汪」汪立峽住的。蘇姐是一個什麼都管、很瑣碎的人，頻頻問我和鍾喬編得如何了，但常常是整個印刷廠版都排好了只等她一篇稿子，我做美編的常會被她氣死，但直到現在我仍很懷念

<sup>04</sup> 《夏潮論壇》於 1983 年 2 月創刊，同年 11 月停刊，1984 年 3 月再推出「革新版」。

連點名時他來視察，看到我，拿著手上的筆一直戳我額頭：「喔！你叫王智章？」我握緊拳頭強忍住。那文一簽上去，師長改成把我關兩個禮拜禁閉，命令還沒下來，他的傳令兵就跑來跟我講：「阿章，糟了，師頭仔改兩禮拜。」我想就算改兩年我也不怕，畢竟我剩 10 天就退伍了，關不到我兩個禮拜啦，後來我被送去憲兵連關禁閉，就是 2014 年洪仲丘被整死的地方，關了我 10 天，多一天也不行。

### 2-2 高雄事件：風聲鶴唳的年代

1979 年退伍後我給自己一次機會，準備考美術系。當年大學聯考就只有師大跟文化大學的美術系，另外就是考三年制的藝專，是分開考的。結果，一次術科過了、學科沒過，另一個學科過了、術科沒過，反正兩邊都沒有上。但對我來講，有沒有考上其實都沒那麼重要。

那一年年底 12 月 10 日發生美麗島事件，黨外人士分批被抓走，施明德卻一直竄逃沒有落網。事件發生不久後就開始傳出有朋友被約談，風聲鶴唳搞得有些比較膽小的人很不安，我記得有一晚，大家聚在崇憲在德惠街的住處談一些事情，講說又有誰被約談了，那晚就有人睡不著、說夢話，那時是那樣子恐怖的一個年代。當時我跟黨外一點淵源都沒有，不過認識田秋堇罷了<sup>03</sup>，那是因為地緣關係，她家在農安街，離德惠街很近，崇憲跟秋堇弟弟田 Bird 是台大同學彼此比較熟而已。沒多久發生林宅血案，我聽到時非常震驚，立刻趕去仁愛醫院，我不知去那裡幹嘛，我進不去醫院，我能幹嘛？那其實就是一個義憤的心情而已。那個年代，我們活在不安、猜忌的氛圍裡，於是，有些人選擇離開，遠走他鄉出國念書，而大部分的人隱忍下來。

當時我還一直想畫圖，有一陣子我住到九份去，租了一間房，房東是一個老先生阿港伯，他的孩子生意做得很好，但他不想離開九份，一個人住在市場旁的老房子裡，我租了二樓在那邊畫圖。那個時候侯孝賢還沒拍《戀戀風塵》，九份還是個安靜純樸的小山村，我每天帶著相機在九份和金瓜石附近晃蕩拍照，什麼都拍，就是沒畫幾張圖。

<sup>03</sup> 田秋堇（1954-），台大哲學系畢業，早期黨外運動者田朝明、田孟淑夫婦之長女，1975 年求學時即幫助宜蘭籍省議員郭雨新競選第一屆增額立委，1978-79 年間積極參與美麗島政團活動，並擔任省議員林義雄的助理，現任僑委會副委員長（2016- 迄今）。

她。那時候我還很孩子氣，在雜誌社的陽台蓋了一個鴿舍，買了幾隻鴿子養，蘇姐常常看我在餵鴿子，好像要看我「搖紅旗」。我們雜誌銷路很差，每次拿多少本出去賣，幾乎就拿多少回來，很快地後面一堵牆全部堆滿雜誌，那幾隻鴿子會飛進來裡面，鴿子飛進來就停在雜誌上，有時候蘇姐在寫稿，鴿子還飛進她的房間裡站在桌上咕咕地叫著。

雜誌賣不好，蘇姐認為書報社故意不發行我們的書或是亂發，就要我跟鍾喬兩個自己去發書。她這個想法害慘我跟鍾喬，我們的摩托車後邊綁一個籃子，載著雜誌到一家一家的書報攤寄賣，簽個單寄賣五本或幾本，等下一期出刊時，五本又收回來，幾乎賣不動。這些都是不好賣的雜誌，搞不好國內賣得比國外差，當時每一期我都要過橋去景美郵局寄給國外訂戶，每期的郵費都貴得不得了。當時印刷都有個基本數，大約兩千本，雜誌社在五樓，沒有電梯，要用扛的，一個月搬一次，真的很辛苦。自己發書只是搞死我跟鍾喬而已，我們很受不了，有一次竟然不約而同在金馬影展遇到，兩個人都溜去看電影，摩托車就放外面，雜誌也沒有人要拿。

在那裏我認識了陳映真、王津平、王曉波一些夏潮的人，開始閱讀政論雜誌和禁書，那時候台灣的政論雜誌都是月刊或半月刊，《前進》是第一本黨外週刊<sup>05</sup>，林正杰跟楊祖珺準備編《前進》時也去找蘇姊討論過。《夏潮論壇》不到一年就停刊了，而黨外週刊越來越多，最多時十幾本同時發行，很需要我這樣的美編。老康（康寧祥）的《八十年代》、許榮淑的《深耕》、Nylon（鄭南榕）的《自由時代》我都做過，每個星期做兩本的話，一個月下來大概有 6、7 千元的收入，勉強可以過。那個時候，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編聯會和社運上面，後來的「原權會」、「台權會」和「勞支會」的會訊都是我義務在編輯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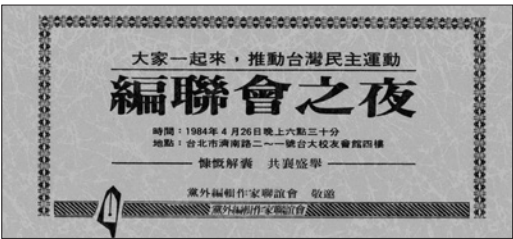
### 3-3 張富忠跟編聯會

1983 年「編聯會」成立時<sup>06</sup>我就加入了，第一任會長是林濁水，半年後改

05 《前進》於 1983/3/14 創刊，名譽發行人費希平、發行人蔡式淵、社長林正杰，是首家週刊型的黨外雜誌，因一再被禁，後陸續以「前進廣場」、「前進時代」、「前進世界」等名稱改版發行，1984 年 8 月再以原名復刊（即總號 21 期）後，仍不脫不斷被禁刊 / 改版的命運。

06 1983/9/3 林正杰、蘇慶黎等邀集黨外雜誌 10 位負責人及新生代編輯在台北紫藤蘆茶藝館

選時張富忠<sup>07</sup>剛出獄，當選第二任的會長，他很積極馬上成立勞工、婦女、生態消費、文化、社會經濟、臺灣史以及少數民族等 7 個委員會<sup>08</sup>，他還設立一個會館，在新生南路三段台大對面的巷子裡一間公寓的



1984 年 4 月 26 日編聯會募款之夜的邀請卡。（王智章／提供）

智章／提供）退伍就住在會館裡，我們常去那裡開會談事情，我還記得蘇姐也找《高山青》的主編夷將（漢名劉文雄，第二屆原權會會長）和 EVAN（伊凡諾幹）等人來開會過，工人小說家楊青矗和勞支會的夥伴也都會來談事情。

我跟富忠是在「前進」認識的，一聊起就很談得來，他跟我一樣喜歡拍照，他送我一些書和攝影集，封面還有蓋章，「自立自強，處變不驚」等等的，這些書是送到監獄給他的，獄方蓋章表示已經通過檢查，後來這些書擺在綠色小組的工作室讓大家看，現在或許放在南藝大庫房收藏了。

現在想起來很怪，哪有一個會長只幹半年的，半年能幹甚麼？可能因為那是「派系」剛開始慢慢形成的年代，編聯會只是一個組織雛形，也是一個民主化過程，大家還在學習、摸索，都會擔心，誰也不放心誰，不想讓一個人在位子上太久，所以才會訂一個半年改選會長的章程。但改選時間太近了，能幹嘛？半年以後，「喇叭」邱義仁接第三屆會長，這些委員會沒有了。

開會，討論成立聯誼會，9/9 正式成立「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」（編聯會），選出第一任會長林濁水、副會長邱義仁。

07 張富忠（1952-），國立藝專美工科畢業，1977 年退伍後與林正杰幫許信良競選桃園縣長，選後編撰《選舉萬歲》一書，積極參與反對運動，為黨外最重要的文宣工作者之一，後因高雄事件被判刑 4 年，1983 年底出獄，先擔任《前進》總編輯，1984/3/12 當選編聯會第二任會長。

08 1984 年 4 月 4 日，第二屆編聯會會長張富忠結合蘇慶黎、胡德夫等原住民運動積極份子成立「少數民族委員會」。同年 5 月 1 日，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（勞支會）成立，由郭吉仁、張富忠、邱義仁、賀端蕃、簡錫堉、袁熾熾、楊青矗、蘇慶黎等人發起。